

浅析东亚的 FTA 热潮

张滨阳

(国际关系学院 研究生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进入 21 世纪, 亚太地区形成了一股 FTA 热潮。推动这股热潮的力量既有各国发展自由贸易的愿望, 又有各国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 还跟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各国负责自由贸易谈判的官僚机构膨胀有着某种联系。在如何评价 FTA 的问题上, 有观点认为双边或区域性的贸易安排与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 地区自由贸易安排的确也给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挑战。考虑到地理位置等因素, 近来形成的 FTA 的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关键词] FTA; 动因; 评价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03)04-0037-03

FTA 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简称。它是指在成员国之间达成的大量减少贸易壁垒的双边和多边协定。在当今国际经贸领域, 除了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外, 在双边和地区层次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排他性自由贸易安排。建立于 1957 年的欧盟(EU, 当时称作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是目前规模最大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据 WTO 统计, 现在约有 50% 的世界贸易发生在有贸易协定的国家之间。

一、东亚形成 FTA 热潮

冷战结束以后, FTA 有激增的趋势。截至 2000 年 5 月, 已经向 WTO 申报并生效的 FTA 有 120 例, 其中冷战后生效的就有 85 例, 占了 70%。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1994 年生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自由贸易区域(AFTA, 1992 年生效)、南美南部共同市场(1995 年生效)

等。可以说, 近年来 FTA 形成了一股热潮。^[1]

自 2002 年夏天以来, 在全球有超过 20 个 FTA 谈判已经启动或者被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上议事日程。2002 年 11 月 4 日中国和东盟 10 国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同意在 2010 年以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1 月底, 日本和新加坡于 2002 年 1 月 13 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新加坡是自由贸易协定的积极倡导者。它除了已与日本达成协议外, 还同新西兰、瑞士、美国等国进行谈判。日本也正在和韩国、墨西哥、菲律宾等国进行谈判。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东盟 10 国除了与中国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外, 也正在同日本、印度和美国接触。此外, 美国也是 FTA 的积极推动者, 它正在和大约 10 个拉美国家、数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以及摩洛哥、澳大利亚等国进行谈判。

看来, 进入 21 世纪后, FTA 又延续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热潮。不过现在这一热潮又有其不同以往的特点。其一, FTA 热在环太平洋地区“热度”比

较高,而尤以东亚地区的密度大、热情高、成果多。东亚地区已经形成 FTA 热潮。这反映了这一地区比较稳定的政治局势和相对较好的经济前景;其二,一些以前对 FTA 持观望态度的国家或地区现在都积极加入了这股热潮之中。此前,从 WTO 公布的材料来看,在国民生产总值(GDP)居世界前 30 位的国家或地区中,尚未缔结 FTA 的只有中国、日本、韩国、台湾 4 个,目前这 4 个国家和地区或者已经签订 FTA 或者正在和有关国家或地区谈判签订 FTA,而且大多有数个 FTA 谈判同时进行。

二、FTA 热背后的动因

此番 FTA 在亚太地区形成热潮,有以下原因:

第一,亚洲国家在经历了 1997 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后,对自身经济脆弱性的担心促使它们寻求建立更紧密的地区联系,以便共同抗击风险。

第二,世贸组织的多边谈判进展缓慢是促使 FTA 热形成的原因之一。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后,WTO 仍然面临核心问题的挑战。但是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第三届部长会议失败后,原定的“新千年回合”谈判受阻。而 2001 年 11 月多哈第四届部长会议后,由于 WTO 成员各方存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利益分歧,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仍然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FTA 就能起到一种从外围突破的作用。由于 FTA 牵扯的方面相对较少,所以与 WTO 费时费力的多边谈判相比,更灵活、更容易达成协议。而且一旦取得进展,也会对其它谈判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中国经济的崛起也促成了东亚的 FTA 热。中国现在被称为“世界工厂”,有报道说 2002 年中国吸引的国外投资超过 500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吸收外资国。西方有句名言:如果你不能战胜对方,就加入对方。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引起了邻国的震动,它们害怕中国逐渐吸走他们的就业和出口机会。因此,新加坡《联合早报》在评论东盟选择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联盟时说这是东盟的“明智之举”。

第四,东亚 FTA 热不仅有经济上的动因,还有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

部长杨荣文说,恐惧和不安全是 FTA 背后的推动力量。日本的经济官员也说,日本选择和新加坡谈判签署 FTA 主要是为了检验日本在东南亚是否能“在政治上被接受”。^[2] 同样,台湾当局选择和日本、美国、东盟签订 FTA 主要是为了抵消大陆与台湾日益加深的经济交流趋势和与美日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FTA 热潮涌动也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各国负责自由贸易谈判的机构和人员膨胀有关。由于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能在双边和地区层次上达成自由贸易协议,也成为贸易官员和机构表明自己工作绩效的证明。因此,FTA 热又有了这样一股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来推动。

三、FTA 热潮的评价

FTA 热潮反映了国际贸易领域内区域主义复活的势头。双边和地区性贸易安排与多边贸易体制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地区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共生”的关系,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3] 一般认为,区域性的贸易安排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推动自由贸易的达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一定的生产关系反映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双边或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正反映了当前国际贸易领域的“生产力”现实,随着条件不断成熟,地区主义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而且,相对比较容易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能够通过“自行车原理”,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发展。^[4] 另外,无限次博弈中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理论(即“无名氏定理”)说明了具有报复能力的区域集团会在非合作博弈中达到互不攻击的合作均衡。因而,尽管各种贸易安排不断涌现,但是类似 20 世纪 30 年代“画地为牢”的区域集团之间贸易战的情况则不大可能再出现。但是,不可否认,地区自由贸易安排的确给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带来了挑战。首先,区域贸易安排能否达到全球贸易自由化进而促进世界福利最大化还是个问题。如果区域贸易协定的成员规模不变,那么 FTA 对世界福利的影响将取决于协定

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大还是贸易转移效应大。^[4]如果是贸易转移的效应大,那么将会降低世界福利的水平。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米德 1955 年的分析,当一个同盟内的关税逐步向零削减时,贸易转移对贸易创造的比例将会增大。欧盟、特别是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的出口贸易变化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据 WTO 统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的地区内贸易比重接近 42%,而在北美自由贸易区 (NAFTA) 成立以后,北美三国区内贸易的比重陡然上升,达到了 56%。^[2]其次,FTA 也可能浪费有限的谈判资源,分散全球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的注意力。而且众多的 FTA 同时存在,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一个企业如果要同几个属于不同 FTA 的国家进行贸易的话,它就不得不考虑去适应它们不同的标准和规定。因而,实际上 FTA 又为自由贸易制造了新的障碍。此外,还必须考虑交叠重复的 FTA 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比如,甲、乙、丙三国缔结 FTA 有两种方式,一是三国组成自由贸易区,二是甲分别与乙和丙达成协定,形成以甲为中心的“轴心—外围”安排。在后一种情形下,乙、丙两国的贸易为了免税而取道甲国,造成运输、管理及寻租等资源浪费,给三国带来的总福利收益较小。同时在利益分配上,甲国赢利而外围国受损,表现在:甲国能降低进口成本,而乙、丙两国却不能;轴心国在所有市场上均取得竞争优势,并在本国产生不可逆的投资聚集效应;外围国面临的行业自由化调整成本要比三国达成自由贸易区时更高。^[4]东盟在同中国达成 FTA 的同时,还在同美、日等国谈判。实际上,在东

亚正在形成以东盟为轴心的 FTA 网络安排,东盟的愿望似乎是在经济上也能起到平衡本地区各大力量的作用。而对处于“外围”的中国来说,如果不想办法自建“网络”或扩大 FTA 范围,就将处于不利地位。

新近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还有跨区域甚至跨大陆的特点,即有意签订 FTA 的国家往往相距甚远,这也给这些 FTA 能否达到促进自由贸易的目的打上了一个问号。北美自由贸易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5]但这与其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是分不开的:其一,在 FTA 谈判之前,北美国家之间已经有了很强的贸易联系;其二,北美经济,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直接投资的数额巨大。而墨西哥接受的直接投资有 2/3 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其三,北美经济联系还受益于彼此之间长期而广泛的人员流动,三国之间边境的人员和货物往来规模巨大。总而言之,地缘优势和已经存在多年的彼此开放的事实促使北美经济的整合水到渠成。

根据 Helliwell 的重力模型,国内贸易的频度要比国际贸易高得多,而在国际贸易中,有共同陆地边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要比陆地边境不连接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 (trade intensities) 更大。^[6] Frankel 和 Rose 发现,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有贸易往来的两个国家的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每增加 10%,它们之间的贸易强度就会下降 10%。^[7]因此,尽管近来人们对双边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热情不减,但考虑到一些客观因素,近来形成的 FTA 热潮效果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参考文献]

- [1] 钟乃仪. 自由贸易协定的理论与实践[J]. 国际观察, 2002 (2).
- [2] Guy de Jonquières. The challenge for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N]. Financial Times, Nov 18, 2002.
- [3] 尹应凯. 国际经贸中多边主义与地区主义共生现象[J]. 对外经贸实务, 2001(3).
- [4] 盛斌. 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制[J]. 世界经济, 1998(9).

- [5] 王晓德. 对北美自由贸易区批评的评析[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1(8).
- [6] Helliwell, John. Globalization: Myths, Facts, and Consequences[M]. Benefactors Lecture. C. D. Howe Institute, Toronto, 2000.
- [7] Frankel, Jeffrey A., and Andrew K. Rose.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Currency Unions on Trade and Output[M]. NBER Working Paper 7857, Cambridg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0.

(责任编辑 双木)